

缙乡人物

那些不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口述 杨学斌 整理 姜新科

这是一张拍摄于1983年2月28日的黑白照片,背面写着“在梅花村会议召开36周年之际,原浙东纵队顾德欢、张任伟、朱敏、马青等领导同志重访遗址时,白岭根村(即梅花村)干部合影留念”,照片前排右四是我爷爷——离休干部杨朝铎先生,前排左四是我奶奶陈彩珍女士,他们都是解放前入的党,我从小就听着他们的“红色故事”长大。虽然他们早已作古,但他们留下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红色故事,依然记忆犹新,永不褪色。

“桑麻甩石器”可狙敌80米外
听爷爷说,1947年1月27—28日(农历正月初七八)两天,浙东工委在白岭根村梅园召开了一次从隐蔽转向公开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重大转折会议。上海局代表顾德欢、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军事干部张任伟,还有许少春等六人参加了会议。当时正值梅花盛开大地飞雪,雪厚达一尺有余,顾德欢同志提议把这次重要会议定名为“梅花村会议”,后来白岭根村也因此改名为“梅花村”。作为早就秘密入党的我奶奶,当时就在做会议烧水送茶的服务工作。解放后的文革后期,顾德欢同志在回忆梅花村会议时,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当时在梅园开会喝茶的时候,一阵风吹过,一朵梅花飘落杯中,真可谓“风吹落花杯中藏,无意酿成梅花茶。世上红花千千万,象征革命数梅花。”第二件事就是,当时为了对付敌人,地下工作者还用桑麻编成甩石子头的工具。用手甩石子只能达到30米左右,而用桑麻编成的甩石子工具,却可以达

到80—100米,有力打击来犯之敌。当时的梅园就是处于门后溪即白溪水岸的一边,离对岸有七八十米远,一旦发现敌人,一边用桑麻编成的甩石子工具对付来犯之敌,一边可以安排开会的同志退到门前山上。可见,当时对开会地点曾做过精心的研究和分析,并做好了应对之策。

三寸金莲挪动200双军鞋
我奶奶加入地下党组织要比爷爷早,而且对爷爷保密。小学毕业的奶奶,她的文化程度可以说是当时全村最高的。1947年1月底,梅花村会议后不久,她以开小店为掩护,方便传递情报,发动并收购村里妇女做的军鞋,支援前线,小店就是当时一个继葛希曾家之后又一个秘密情报站。有一次,做好的军鞋堆在柴房楼梯下面,至少有一二百双,听说村里来了国民党兵,奶奶急得团团转,那可怎么办?没办法,只能几双几双用两手拿到前面梅哥家园子的茶树弄里。可怜奶奶的那双三寸金莲,一步一步最后总算把草鞋全部搬到了茶树弄里,此时的奶奶已经累倒在园里,幸好等她醒来时已经安然无恙了。

爷爷和哨兵拼刺刀
受奶奶的影响,我爷爷也倍受感染。有一次,奶奶接到上级一个重要情报,马上要送到四明山游击队。爷爷自告奋勇接受了奶奶的任务,出发时带上奶奶做的麦饼,作为路上充饥的干粮,把情报用绷带绑在小腿上,装扮成打柴的山民,扛着铤杠柴绳。从白岭根到四明山,爷爷一连奔波了四天四夜,才把情报送到地下党领导的手里,受到地下党领导的高度赞扬,当时就加入了共

产党组织。回来的路上,由于麦饼全部吃光了,一路上只好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才到一户冒着烟的山里人家那里,要了一碗粥充饥,谢过之后又沿着革命的道路继续前进。就在半路上爷爷看见一个国民党哨兵站在一个村的路口。哨兵一边盘问爷爷,一边用枪上刺刀挑衅爷爷。爷爷也不示弱,他用铤杠和哨兵对打了起来,由于爷爷有1.83米高大的身材,哨兵哪里是爷爷的对手,结果被爷爷打趴下了,爷爷就夺了他的枪,扔了铤杠。由于带枪一来不安全,二来太重了,就取下枪上的刺刀,扔了枪身,径自回家了。这把刺刀就是爷爷当年从国民党哨兵那里夺来的原物,现在保存在梅花村家里。

蜘蛛网骗过国民党兵
1948年冬,我爸爸虽然年轻,但也有十五六岁了,多多少少受到过爷爷奶奶的影响。有一天,我爸爸和爷爷奶奶三人共演了一场惊险又精彩的“大戏”。



当时在我家二楼,也就是小店的楼上,打地铺住着地下党领导顾德欢。国民党兵听到消息后,进村来我家搜查。我爷爷奶奶马上跑到二楼,请顾德欢到隔壁房间暂时躲避一下。随后,他们把堆在旁边的柴禾搬到地下党员睡的地铺上,并叫我爸爸把事先准备好的一瓶花蜘蛛,撒在柴禾上。不一会儿,蜘蛛一下子就在柴禾上布满了蜘蛛网。结果哨兵上楼一看,没发现异样,就下楼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爷爷陪着顾德欢同志,通过前山脚一个小庙,请了令箭,一直送他到前山头,叫他沿着山岗转道山洋革命根据地。我听后,真为爷爷奶奶捏一把汗哪,又为他们的机智勇敢竖起大拇指!

岁月悠悠,人事匆匆。决定浙东工委命运重大转折的梅花村会议,至今已有75周年,新中国建立也有73周年。在幸福安康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为建立新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作为革命后代的我,有义务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知青在大蔡

孔林根

1955年8月,由60名队员组成的青年垦荒队,在黑龙江荒原垦荒,种植水稻、蔬菜等,取得成功,于是河北、上海、浙江等省市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拉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上山下乡”的热潮。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先后有20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告别自己的父母亲人,卷起铺盖行李,到云南、到新疆,到西北大草原,到陌生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1966年9月到1974年12月,深圳镇大蔡村就有来自上海、宁波、宁波的53名知识青年来安家落户,开启走向农村的全新的生活。

到大蔡插队的知青,大部分有祖父母、外公外婆和叔叔伯伯在这里,他们是寻亲插队。大蔡村群众在没有任何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无私地接纳了他们,把本来就紧缺的粮食省下来给他们吃。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十分重视,关心知青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关注知青的思想动态,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让他们安心下来适应农村生活。除了几个自己和生产队联系好的,女知青和部分男知青都分配到林业队,让他们在一起方便管理,由副队长专门负责安排他们劳动,有技术员专业指导。这些十五六岁刚读初中的懵懂少年,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做农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习惯。那时农村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知青们学农村人打理生活,每天起早挑水,跟农民到山上捡柴,乡亲们帮他们把柴捆起来,用冲担穿好,挑到相对平坦的地方让他们挑回家。有一次,一个近视的女知青挑着柴禾,柴把上缠绕着一条蛇,她却浑然不知。刚好过路的农民看到了,叫她别动。用棍子把蛇挑开了才告诉她,让她后怕不已。土灶烧饭非常难,终于点燃了柴禾,不一会又熄灭了,几次三番也烧不好饭菜。热心的大妈看着心疼,耐心地教会知青怎样生火做饭,有时会拿点烧好的菜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得人瑟瑟发抖,江南湿度大,0℃以下就会冷到骨子里,知青们还在垦荒造林。夏天骄阳似火,把人晒得面红耳赤,晚上恼人的蚊子在耳边嗡嗡地叫,让人难以入睡,好心的群众给知青拿来艾蒿点燃驱逐蚊子。在田间、山路会碰到蜥蜴、蜈蚣、蛇,树枝上到处有毛毛虫,经常会吓得尖叫起来。学做农活,锄头都握不好,不知道怎样使劲,是乡亲们手把手教会握锄头的姿势。拔秧、插秧,双脚浸泡在寒冷的水田里,不一会就腰酸背痛,站立不起来。尤其是插秧,农民伯伯可以插得整整齐齐,知青们插起来东倒西歪,溃不成行。有经验的社员教他们眼睛看好第一行秧苗,双脚后退的时候要直,脚印弯了行距就歪了。经过多次的练习和实验,插好的秧苗看起来总算像点样子了。林业队采茶还好点,春天虽然阳光也强烈,但还不至于灼热。摘果子只能站在地上摘低矮的,长在高处的

不敢攀爬,只有让林业队其他社员们去摘。知青还参加了曹坑造水库、造长洋至大蔡公路、西店围海造田等工程,大娘岗、前山后山庙子山都留下了知青们的足迹。农忙的时候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出工,因为农活是有季节性的,尤其是“双抢”的时候。每天夜晚,知青们都要聚集到生产队,复核一天的工分,接受队长分派明天的劳动任务。农村的道路崎岖不平,黑灯瞎火的让人害怕,尤其是年纪小的女知青,夜里不敢独自走路,有时乡亲们护送,有时年纪大的知青陪伴年纪小的,等点上灯、关好门才离开。如果是夜里做茶叶,则由林业队负责人指定人员护送回家。每天早晨和午饭后,知青们都在大蔡供销社门口集中,时间长了,和附近供销社的职工、医院的医生都熟悉了,有些成了朋友。为了丰富知青的业余生活,还组织了文艺小分队,业余时间学唱革命样板戏,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在大蔡公社甚至到隔壁奉化县的几个乡村演出。几年下来,知青们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学会了挑水、砍柴、翻地、锄草、插秧、栽种茶叶、草药,学会了制作茶叶……手上磨出了老茧,脚底经常起泡,身上到处有蚊虫叮咬、刀割刺拉的伤疤,但他们克服了劳动和生活的困难,强忍着对父母亲人的思念。没有退缩,没有沉沦,他们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虚心学习,拜农民伯伯为师,不怕苦不怕累,锻炼了意志和体魄,为自己青涩的年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宁波日报》《浙江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相继报道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农村劳动报酬是每天记工分的,根据能力的大小,从每天2分开始,最高记10分。由于知青们没有劳动技术,女知青底分从2分开始,慢慢加到4分、4.8分;男知青最高也能评到8分、9分。夜里制茶是不记工分的。如果劳动报酬不够买口粮,知青的家长去寄钱来补足口粮钱。

随着招工返城政策的落实,知青们陆续离开了大蔡,有些回到大城市,有些做了农村教师,弥补了大蔡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不足,为推广和普及普通话做出了贡献;有些到乡镇当了干部,有些做了医生,有些进了企业……他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这段苦涩的岁月谁也无法忘怀。知青们回城市后,会经常聚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热心的知青会组织聚会,以上海知青为主,宁波、宁波的知青也会赶过来。插队三十年后相聚大蔡,大家到老书记胡未庚坟前培土、献花,表达哀思。2019年5月17日,在知青插队大蔡五十周年的时候,大家又一次从上海、宁波、宁波及海外赶来相聚大蔡,重拾在苦难中磨练的深刻记忆,感恩父老乡亲的关怀。

如今的大蔡已今非昔比,知青们生活、劳动过的地方也变了模样。为了纪念知青在大蔡的这段经历,深圳镇大力收集知青们的照片、使用过的工具和生活用品,打造一个知青之家,让知青们经常回来看看自己生活、劳动过的地方,让我们的后代拂去尘埃,了解这段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往事。

青珠山、黄珠山的故事

徐孝冰

1271年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从而造成民怨四起。宋末进士宁海县西乡人杨镇龙看到受压迫的百姓生活艰难,于公元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二月揭竿而起,受压迫农民踊跃加入起义队伍。元朝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派兵镇压。宁海一带百姓四处逃避。
为斩草除根,元朝浙东宣慰使命令官兵对宁海西乡进行拉网式的搜查。基于当时宁海海运发达的实际,同样不放过对宁海东乡长街一带的搜查。宁海东乡长街百姓很是担心,但日子还得继续过。
话说青珠、黄珠两姐妹,她们生活在宁海东乡长街。由于家里缺乏青壮劳力,从小生活过得很艰

苦。人穷志不穷。她们向当地百姓学习种稻、养蚕、纺布、捕鱼、晒盐等技术,一学就会,样样精通,家里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父母脸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多。虽然她们没有上过私塾,儒家思想的做人理念却深深扎根于心中。因此,她们将自己的农作、晒盐等技术毫不保留地教给长街一带百姓,还将她们的劳动果实分给贫苦百姓。
东乡长街、力洋一带的大户人家得悉青珠、黄珠两姐妹的善良聪明,纷纷到她们家提亲。她们婉言拒绝。原因很简单,家里没有兄弟,一直是家里的主劳力、顶梁柱。这样一来,青珠、黄珠两姐妹的婚姻大事一再耽搁。转眼间,已是二十出头人见人爱的漂亮女子。
二月中旬的一天,元朝官兵乘船到达长街一带,准备搜捕起义

军。了解到青珠、黄珠两姐妹的真实情况后,准备将她们献给浙东宣慰使。于是,元朝官兵就守候在她们家门口。
临近中午时分,青珠、黄珠两姐妹载着满满一小船的海鲜回家,远远看到一大群官兵出现在自己家门口。她们立刻摇着小渔船离开。这一情况被官兵发现,马上起帆追击。当青珠、黄珠两姐妹逃到长街东南方向两座山之间的大海时,官兵船只将她们的小渔船紧紧围住。面对此般情形,青珠、黄珠两姐妹义无反顾只身跳入茫茫大海之中。
心痛归心痛。长街百姓念及青珠、黄珠两姐妹生前所做的好事,就将她们跳海地方附近的两座无名山定名为青珠山、黄珠山。青珠山、黄珠山就这样叫开了。

